

《周易》系统中的符号修辞初探

苏 智

(浙江音乐学院 公共基础教学部 浙江 杭州 310024)

摘 要: 比喻和反讽作为文学修辞常用的手段,进入符号修辞的视域后,其功能也突破了语言局限,上升为表意层面的概念比喻和大规模反讽。在《周易》中,阴阳对立、八卦成列以及卦画符号本身的爻位图式从符号表意的角度看都是概念比喻的呈现。《周易》的卦序排列以及爻位时序变化则反映出一个“始、壮、究”的历程,既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符号表意中的大规模反讽。《周易》符号的理据性变化在表意实践中通过比喻、反讽以及象征等修辞手段来辅助生成,并最终在这些符号的修辞运用中得以体现。

关键词: 《周易》; 符号; 修辞; 概念比喻; 反讽

中图分类号: B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0964(2017)03-0025-05

《周易》的表意符号存在复杂而多重的特点,不同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异的特质与类属。相似符号与其表意对象之间有一定的形象关联,而规约符号的表意完全依靠任意武断的规则来连接。与规约符号相反,当符号表意不以任意性为原则时,将这一相反的符号表意规则称为符号的理据性。

一、《周易》中的概念比喻

比喻是最为常见的修辞手段,所有的符号体系都可以被认为是由比喻累积而成。“任何符号都从广义的比喻进入无理据的规约性。符号体系正是靠了比喻而延伸,由此扩大我们认识的世界”^{[1]188}。在符号修辞中,比喻必须在多种符号系统中被通用,这样就必然关注到“概念比喻”的问题。

概念比喻并非一般意义上增益文采的语言修辞技巧,而是一种人类符号思维表达的根本性方式。概念比喻必须在多种符号系统中通用,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或符号来表达,在两个概念域之间形成一种超越中介的映现关系^{[2]78}。因此,概念比喻不是一种文化所独有的表达,也不限于专门的语言与媒介系统中,而是在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的隐喻形式。在《周易》文本中也不乏这类概念比喻,这些比喻可以反映出人类所惯有的思维方式,同时在其象征喻义的形成过程中展现了符用理据性的积累生成。

(一) 阴阳对立中的概念比喻

符号表意直接关涉能指与所指的双重分节。马丁奈对双重分节的概念有过清晰的论述。他把第一层次的最小有意义分节称为 monemes,与此对应出现的是发音的最小分节因素 phonemes^{[3]45},即意义单元与语音单元的对应。叶尔姆斯列夫推进了这个理论。他认为“语言最基本的双重分节,不是在词素与音素之间,而是在‘表达’与‘内容’这两个层面之间”^{[4]56}。“表达”是符号的能指部分,“内容”是符号的所指部分。每一个符号都是能指的一个分节,而对应的阐释内容则是所指的分节。如中国人有红、橙、黄、绿、青、蓝、紫这几种典型的颜色符号,其所指的实际色彩也在光谱中被清晰划分出七种不同的颜色范围,这就是符号双重分节的对应。整个符号系统都是由分节的集合构成,因此,符号学也是一门分节的学问。《周易》表意的基本符号是阴爻与阳爻。阴阳爻符号是事物特性被高度抽象出来的符号载体。我们常说的阴阳二元实际上隐喻的是人类思维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思维。世界上其他民族虽然不谈阴和阳的问题,但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却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这是人类共有的符号分节问题。

从阴与阳的符号意义来看,阳蕴含着积极、刚劲

收稿日期: 2017-03-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123)

作者简介: 苏 智(1987—),女,辽宁沈阳人,博士,讲师,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主要从事《周易》及传统文化的符号学研究。

的运动态势,阴则相对静止、保守而柔弱,阴和阳是对现实事物性质的抽象隐喻。按照《周易》的规则,事物虽有千变万化的复杂状态,但主导变化的奥妙无非是阴与阳之间的生息消长,这反映的是一种力量与另一种异质力量之间的斗争与交融。“子曰:‘乾坤,其易之门耶?’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5]89}。丁尔苏将概念比喻称为“概念性隐喻”。他认为这种隐喻具有自身的特点,它们因为抽象程度的不同而形成上下结构关系,越靠结构的顶端就越抽象,从而囊括下面抽象程度较低的概念性隐喻^{[6]59}。因此,阴与阳具有的高度抽象性也就足以包容其类属中的一系列事物一般本质的对立。生活中的一些概念,如善恶、动静、男女之别都与这一概念比喻中的衍生息息相关。阴阳抽象的二元之下存在着不同领域中的对立关系,涉及宇宙自然与社会伦理的方方面面。《周易》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5]93-94}阴与阳虽从天地之体性上来,却不仅仅隐喻天与地,而是从天地之性中抽象出了两种气质变化属性,并将其他对立概念的关系囊括于阴阳二者之中。因此,从根本上讲,阴阳是对抽象本质的隐喻,其存在反映了对立分节思想的普遍运用。

在人类创造的不同文化中,对立与分节的思想无所不在,最明显的一种表现是善恶二元的对立。阴阳的隐喻中有些只是一般自然属性的划分,也有不少的对立分节带有伦理上的褒贬意味。阴意为刚正,而阴意为邪僻,便有了所谓的“阴盛阳衰”之论。《周易》乃卜筮之书,在民间被广泛地运用于算命,这在许多优秀的古代著作中有过相关描述。《红楼梦》中“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节描述贾宝玉性情时,借着贾雨村的口发出过这般言论“天地圣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皆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7]29-30}此言大致意思是说,天地生人,除了大仁大恶,其余的芸芸众生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大的差异。对于大仁大恶两者,大仁者应运而生,有修治天下之功,所以大仁者降生就天下大治;大恶者应劫而生,有扰乱天下之能,所以大恶者出世就天下大乱。天地之间又有正气和邪气的不同。正气清明灵秀;邪气残忍乖僻。秉受正气出生

的人日后成为仁者,秉受邪气出生的人日后成为恶者。这些言论其实都是对《周易》命理学说的发挥,其理论源于阴阳二气的卦气性质差异,从逻辑上归根结底还是阴阳善恶的双重分节。

善恶对立在各种文化中均存在,在《周易》中,可以用阴与阳气质化符号来表现,而在异质文化中可能更多地是以人格化载体之间的斗争来表现。例如基督教中上帝与魔鬼的对立,佛教中释迦牟尼与提婆达多的对立,拜火教神祇中阿胡拉与阿赫里曼之间的较量,这种对立几乎成了所有神话的共同母题。正邪之间必是二元对立,不可正邪不分,也不存在不善不恶。虽然现实中善恶的判定标准很复杂,但至少在人们的思维中不存在这种骑墙的分节方式,否则当胜利者高举着正义的旗帜呐喊时就会显得苍白无力。而人们之所以弃恶从善与邪恶划清界限,归根到底的思维基础就是绝对二元对立的存在。这在任何民族和文化中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周易》中的阴与阳具有复杂的隐喻意义,作为概念比喻,其背后反映出的是一种人类思维中普遍存在的对立分节方式。

(二) 八卦元素中的概念比喻

《周易》中的八卦比喻了自然中不同的物象:《乾》卦喻天,《坤》卦喻地,《离》卦喻火,《坎》卦喻水,《艮》卦喻山,《巽》卦喻风,《震》卦喻雷,《兑》卦喻泽。这些卦画符号在图像的相似性上与所指的事物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而在符号的规约上,通过对符号意指的生发,八卦所喻的代表性事物背后还存在着一系列庞大的物类集合,这些在《说卦》中有充分的解释。以《坎》卦和《离》卦为例,“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5]95};离卦的寓意同样复杂,“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5]95}。因此,八卦的比喻不仅仅是停留在具体物象上,其更具有元素类别的性质。圣人仰观俯察,在自然生活中总结出了最根本的宇宙元素。八卦从表意上看是对这些宇宙元素的隐喻,而从深层次来看,其反映的却是古代先民对宇宙成分划分的思维传统。并且,这种思维并非中国人所独有,而是人类普遍的认知世界的方式。

八卦的隐喻是对宇宙中不同事物及其功能的分类。“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5]94}。

各类事物都有专门的符号来隐喻,其作用也不尽相同“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5]94}在实际的卜筮中,《周易》的八卦还要与五行相结合,通过八卦的五行类属和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来确定所占问事物的吉凶。《乾》卦与《兑》卦属金,《坎》卦属水,《离》卦属火,《巽》卦与《震》卦属木,《艮》卦与《坤》卦属土。六十四卦中每一别卦由两个经卦组成,根据所变之爻确定体用,再依照五行生克确立上下二经卦的体用生克关系。可见,八卦卜筮的原理与五行类属密切相关。八卦本身具有元素性质,而五行理论则是更为纯粹的宇宙元素建构学说。这种通过元素划分来喻指宇宙万物的思维方式在其他古代民族中也有体现。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火,泰勒斯则认为是水,而古印度更是提出了地、水、火、风的“四大”学说。任何事物都产生于这些“原初物质”,最终又必然回归于这些“原初物质”。虽然各种学说中运用的隐喻符号各不相同,但从运用比喻的思维上来看,这些学说却与《周易》中利用八卦元素对宇宙进行符号分节与建构的方式是一致的。概念比喻关注的不是所用符号的表现形式,而是要透过比喻的形式,发掘建构比喻的根本思维方式,这也正是深度探究《周易》符号表意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 卦画图像中的概念比喻

《周易》的卦画符号是由或断或续的阴阳爻线段叠加而成的。八经卦卦画中有三条线段,六十四卦则有六条线段。这些线条从低至高排列,组合成各种图像符号,体现出了事物发展的承进关系,图像具有直观性,相比语言符号更能够呈现思维的映像特征。在符号阐释中,这类符号也具有呈位解释项的作用。正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8]19}我们思维中的很多东西都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而图像符号则弥补了语言的不足。同时,在不同文化的比较中,图像却很容易呈现出思维的同质性。

卦画符号的高低排列展现的是事物发展变化中的不同态势。初位处于最下,是事物刚刚萌动的状态。然而正所谓一叶知秋,通晓其义的人往往可以见微知著。故《坤》卦初六爻即言“履霜,坚冰至。”《坤》卦六爻皆为阴爻,阴爻本象征天地间阴寒之气,在伦理上有阴柔邪僻的意思。初位上阴爻的寒气只是刚刚凝滞,因此是“履霜”,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其后坚冰将至是可以预见的。运用到人事的隐喻上,《文言》解释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

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5]19}这是从事物初始状态及其渐变趋势中领悟出的道理。二位即是事物之质性得以彰显的阶段。《乾》九二言“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三位与四位是事物顺势发展的阶段,此二位分别处于下卦之末与上卦之初,是一个跨阶段的迈进,象征了发展中可能遭遇多重的阻滞。五位已为一卦中的高位,也是上卦的中位,算是全部爻位中最为强盛和尊贵的位置。在《周易》中,古人将“中”的概念用一种隐喻来表达,即六爻卦中的上卦中爻和下卦中爻,也就是所谓的中位。将二爻与五爻视为中位也属于概念比喻的表现形式。《乾》卦九五爻说“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五位是一个符合英明刚健的君主所处的位置。故而《周易》中用“九五之尊”来喻指君王。这个比喻在生成和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增强理据性,使社会大众广为接受而最后发展成为一种象征。上位是一卦之末,行为的终结阶段,故有“亢龙有悔”之患。从卦画符号中爻位的高低变化与所喻指事物的关系中可以发现,这种图像的层次喻义与事物发展的进程是同构的。图像只是事物发展态势的一种直观表达形式,在不同的文化中可以找到相似的比喻手段。在现代,人们利用图表或坐标轴作为统计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描述随着时间变化的事物发展状态,这恰恰反映了人类所固有的思维模式。概念比喻不一定要以书面符号的形式呈现,在建筑、绘画等多种媒介中均可以发现这种思维的呈现形式。或者说,这些相似的表述实际上是一种人类根本性思维方式的展现。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便是概念比喻,随着比喻不断被使用,其符号喻义与事物之间会逐渐生成象征关系,符号从而也就获得了符用理据性。

二、《周易》符号表意的大规模反讽

反讽源于古希腊喜剧,最初指的是一个擅长动用潜台词击败对手的角色。后来反讽逐渐演变为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段,其特征是表层的辞令后面寓有丰富的潜台词,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嘲弄式的反衬。如当兴致勃勃准备第二天去郊游的时候,却偏偏赶上上下暴雨,如果当事人说“天气真是太棒了”,就是运用了反讽的修辞手段,用以表达其失望的心情,自嘲运气不佳。反讽辞句中只出现相互对立两种含义中的一种,而与字面意义相反的含义要解释者在双重含义的相互颠覆中思考得出,正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

然而,有一些依托于大规模的情景、历史或在戏剧中上演的反讽,不再局限于日常行为的表意,而直接反映人们对宇宙和人生的理解,这类反讽可以称

之为“大规模反讽”,或“大局面反讽”。普通类型的反讽往往是修辞使用者有意为之,达到“口是心非”的表达目的。而大规模反讽却意在宏大的叙事背景中呈现出巨大的悲剧意味和历史沧桑感,富有引人深思的哲理。《红楼梦》中“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一回,描写了贾探春所掣花签上面是一枝杏花,写着“日边红杏倚云栽。”注云“得此签者,必得贵婿,大家恭贺一杯,共同饮一杯。”此签是对探春日后命运的暗示。众人取笑探春得贵婿,恐怕也要当王妃。按前80回文本中的这些线索及册辞,后来上演了贾探春远嫁藩王的一幕,探春果然得了“贵婿”,应了“王妃”之命。如果从花签谶语和后来的探春命运的写照而言,探春得“贵婿”都在原文本及其衍生文本中有正面描述,而反思这一事件本身,人物的命运却折射出了悲剧的意味。从这个角度来讲,《红楼梦》对于贾探春人生的描写就是一个反讽,而且属于大规模反讽中的命运反讽。其实,如果用符号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日常生活,“大规模反讽”的效果是无处不在的。《周易》包含了宇宙时空的变化规律,通过文本分析会发现,在其对事物变化规律的表述中普遍存在着这种大规模反讽。

《周易》文本中的大规模反讽几乎出现于符号的各层次内,其最基本的阴阳符号消长变化可以体现出这一特点。按照《周易》卦画的六位排布,每一位都由阴爻或阳爻占据。阴阳爻在高低不同的位次中以不规则的频率反复交替呈现,喻示事物的运动变化态势。无论是阴还是阳,都不能违背事物的发展规律而长期保持自身性质不加改变。所以,卦画中的阴阳以爻打破的方式呈现出多种变化。最典型的例子还是《周易》中的《乾》卦,其六爻表现了万物运行,天地人发展变化的过程。从“潜龙”到“亢龙”,都依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准则。但是不断奋进不断上升的最终结果却是“亢龙有悔”,过犹不及。事物的发展转而走向了预想趋势的反面。万事万物,包括人事皆同此理。阴阳变化之间,阳不可能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这是在阴阳的消长变化中呈现出的一种“大规模反讽”。同样的道理,在《益》卦上九中说“莫益之,则击之,立心勿恒,凶。”^{[5]53}处《益》卦的极点,盈满过盛,却贪得无厌,所以凶险,增益的结果也出现了与初衷相反的走向。欧阳修认为变动不息乃事物得以长久存在的基本法则。他在《易童子问》中阐述了这种物极必反的道理“阳过乎亢则灾,数至九而必变,故曰见群龙无首吉。物极必反,数穷则变,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

不可为首也。阴柔之动,多入于邪,圣人因变以戒之,故曰利永贞。”^{[9]215}由此也可看出,阴阳皆不可持久,其消长变化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渐进过程,这是大规模反讽形成的基础。

郑康成在解释《周易》时曾提出,一个事件的发生过程遵循着“始、壮、究”的规律。这个过程可以用抛物线来描述,始就是开始,壮是事物发展壮大阶段,而究就是走向衰落,濒临终结。《易经》中的八经卦用三画来表现事物发展的这三个阶段。三画分别表示“始、壮、究”三项,每一项便是卦画中的一爻^{[10]9}。在六十四卦的卦画中,虽符号的图像构成略有差异,但其中的道理却是一样的。如《中孚》卦,信发于内,是为中孚。初位到五位皆随着诚信之意的的发展,其所征之意为吉或无咎。而上九曰“翰音登于天,贞凶。”^{[5]71}这即是因为上九处于信之终,信终则衰也。信衰诈起犹如飞鸟之翰音响承于天,但无非华美外扬而忠笃内丧,虚声无实所以才会出现凶险。可见,即使是六爻的卦画,其表意也遵循着物极必反的原则。结合上文所说的阴阳消长变化即可发现其中的发展规律,阴阳爻的交替在卦画位置中起作用,象征事物运转的渐变过程。卦画中所展现出的“始、壮、究”的意义是渐变中产生的质变效果。这象征着事物的运行从初始到壮大,但最终会走向自身的反面。也就是说,无论阴阳的消长变化还是卦画中符号位置的发展态势,都蕴含了大规模反讽普遍存在的因素。

即便是在《周易》各卦之间的顺序排列上,我们依然会发现相邻的卦彼此间存在意义关联。《泰》卦坤上乾下,阳气上升,阴气下降,象征着天地交泰。然而,紧承其后的却是《否》卦。《否》卦在卦画上与《泰》卦正相反,乾上坤下,因此也就表示天地不交,万物不同。《否》与《泰》之间意义相反,并相互转化,故有“否极泰来”之说。又如《剥》卦,六爻卦画中除上位为阳爻,其余皆为阴爻,象征着五阴剥一阳,阳气渐尽。但《剥》卦之后出现的《复》卦却与《剥》卦正相反,有五个阴爻在上,初位为一阳爻,说明阳气始复。“剥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时也。剥尽则复,否极泰来,消必有息,盈必有虚,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顺其时而止,亦有时而进也”^{[11]518}。这种转折变化不仅出现于以上这几卦中,而且在《周易》许多成对出现的卦中都表现出与之相同的规律。这既表明了自然界生生不息的循环规律,也同样具有事物发展的大规模反讽意味。

《周易》六十四卦的整体排序蕴含了事物在不同时空场域之间的转化规律^[12]。正如《序卦》所说,

天地创生之后乃有万物。万物在宇宙中发展自身,并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多种情状。依据自然的运行,天地万物之后必然会有男女、父子、君臣等社会人伦关系,因此,《周易》规律不仅关乎天地自然也同样关乎人类社会的行为伦理。最终,事物的发展会接近于完善。这在六十四卦的倒数第二卦《既济》中得以体现。《既济》卦的卦画为坎上离下,六爻的阴爻与阳爻全部当位,但其卦辞却说“初吉终乱”。在万物皆吉的终结也就必然走向败乱。《既济》之后的《未济》卦作为《周易》的末卦,其卦画与《既济》卦相反,离上坎下,六爻阴阳皆不当位,事物的发展打破了完善,陷入到了相反的状态。因此,在《周易》文本中,从最基本的阴阳消息互变,到卦画六爻的位次的高低喻义以及卦序的错综排列,甚至连同整部《周易》卦象的循环,都反映着事物运行发展之中这种转折变化的规律。由此可见,《周易》普遍存在着大规模反讽。

大规模反讽的修辞形式往往伴随着符号的理据性变化,因为在符号系统的表意中,大规模反讽的出现皆会暗示事物发展的戏剧性转变。从符号修辞的理据性问题上分析,会发现反讽修辞本身在颠覆了原有理据性的同时又生成了一种新型的符用理据。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料定曹操在赤壁大战之后会败走华容道,但他却有意派关羽去截杀曹操。关羽极其重义,又受过曹操恩遇。诸葛亮其实早就算准了关羽必不忍杀害曹操,会将其放回许都,他安排关羽去把守华容道是存心放曹操一马。在诸葛亮看来,如果此时杀掉曹操,那么北方必乱,诸侯间展开争夺权力的新一轮角逐会给日后收复北方造成更大的麻烦。同时,已经形成的孙刘联盟的关系也会随之转为敌对,这对于势力尚不稳固的刘备集团极为不利。联吴本来是要抗曹的,最后却有意保全了曹操,原本的意义建构发生了颠覆,其中的道理大可以质疑。但是这段故事经过历代读者反复的评论,诸葛亮的主张反而获得了更强的理据性。这就如同前文提到的例子,《剥》卦是众阴剥一阳,与之相反,《夬》卦初位到五位俱是阳爻,只有上位为一个阴爻,此乃众阳决一阴。按照阴爻与阳爻的隐喻意义,阴爻通常被意指为小人,而阳爻被意指为君子或大人。因此,众阳决一阴也就意味着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然而,《夬》卦的《彖辞》却说“所尚乃穷”^[5]⁵⁶,这就是说若事物按照这种发展进行下去,那么小人之势必然会尽皆败落,则阳决阴的态势也

就走到了尽头,这样就会导致物极必反。正所谓“夬,刚决柔之卦也。五阳而一阴,决之虽易,而圣人不欲其尽决也,故其彖曰:所尚乃穷也。小人盛则决之,衰则养之,使知君子之为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禄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极而必反,不可以不惧,故其象又曰居德则忌”^[9]²¹⁸。处于《夬》卦之时,纵然消灭小人之势很容易,然而君子却不应将其势尽皆除去,甚至应对其给予适当的扶持,这样才能保证上下和悦,泰然无忧。若不然,则会出现符号修辞中的大规模反讽。因此,《夬》卦原本是君子道涨、小人道消的意思,而一旦出现了大规模反讽,其原本的意义发生了转变。如果符用被不断加强,那么理据性就可能出现逆转。

综上所述,《周易》中存在大量的符号修辞,概念比喻和大规模反讽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修辞形式,体现在《周易》符号系统的各层面上。符号修辞影响着《周易》结构的意义生成,同时也体现出了符号应用中的理据性变化。

参考文献:

- [1]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2] 胡易容, 赵毅衡. 符号学—传媒学词典[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3] MARTINET A. Elements of General Linguistic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 [4] HJELMSLEV L. Resume of a Theory of Language[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5.
- [5] 王弼, 韩康伯, 孔颖达. 周易正义[M]//十三经注疏.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6] 丁尔苏. 符号学与跨文化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 [7] 曹雪芹. 红楼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 [8] 李耳. 老子[M]. 张兆裕, 编著. 北京: 燕山出版社, 1995.
- [9]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张春林, 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 [10] 牟宗三. 周易哲学演讲录[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11] 欧阳修. 欧阳修集编年笺注[M]. 李之亮, 笺注. 成都: 巴蜀书社, 2008.
- [12] 曹悦. 《周易》中的生态美学思想与劳伦斯生态理念的对比分析[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6(1): 118-122.

(责任编辑: 蔡宇宏)